

學人生涯堪回首

● 蔡 波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合肥：黃山書社，2008）。

封閉的年代曾隔開、疏遠了一切可資傳承和參照的東西。或許由於十九年的海外學人生涯，蕭公權先生，這位上個世紀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政治學家，帶給我們的是一種難言的疏離感。蕭公權的《問學諫往錄》（引用只註頁碼）在中國大陸出版，使我們有機會走近這位著名學人。在這部自傳裏，透過多變的

世事風雲，透過無奈的理性抗爭，我們清晰目睹了昔日學人的平凡和崇高。在滿足所謂「知古」偏好的同時，後人會依稀傾聽到一種文化脈息的聲音。

一 「不做『官』，專求『學』」

在結語部分，蕭公權這樣談及自己的兩段人生（1902至1926年和1926至1968年）：在前一段，即「我的學生時代」，「在這二十四年當中，我受過中西新舊方式不同的教育，得到國內外良師益友的訓迪啟發。父母雙亡，國家多難，我的學業竟未曾間斷。我是一個不幸環境中的幸運之人。」而在後一段，即「我的教學時代」，「這四十二年，我先後或同時在國內十二個公私立大學——民國、南方、南開、東北、燕京、清華、北京（兼課）、四川、光華、華西、政治、台灣——和美國一個州立大學——華盛頓——授課。」（頁223）

六十六年問學路，在那個時代不可謂不長；蕭公高壽，竟用這麼長的時間求知問學，正如他所說，

六十六年問學路，在那個時代不可謂不長；蕭公權能夠在如此漫長的日子心無旁騖，篤誠問學，這確實需要非凡的信念和意志，正如他所說，「是一個不幸環境中的幸運之人。」

立志不做「官」、專求「學」，這是蕭公權作為一個職業學人的不變信念。他和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求學目的是為了救國。他認為讀書應該不忘救國，但救國先必讀書。

「是一個不幸環境中的幸運之人。」除去最後十九年在華盛頓大學教學的安寧日子及中間的國外留學生活，餘下的歲月無疑是充滿顛簸和苦澀的。能夠在如此漫長的日子心無旁騖，篤誠問學，這確實需要非凡的信念和意志。

為甚麼蕭公權沒有像他的同事蔣廷黻那樣學者從政？或者像他的許多政治學同行那樣熱衷於參與現實政治？1939年1月，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1946年撤銷），延攬若干著名學者參與其間，他的昔日同事、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浦遜生、王化成應邀就任參事。蕭公權也在應邀之列，但是他沒有被張群所打動，放棄了這次「生平唯一從政的機會」。後來他又說服陳布雷，「放過了入黨的一個好機會」；更有甚者，他連校方提供的行政職務也不願擔任（頁169-70）。

立志不做「官」、專求「學」，這是蕭公權作為一個職業學人的不變信念。他和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求學目的是為了救國。「民九以後若干年間國內政治紛繁，內戰頻起……國內的現狀如此，我只是埋頭讀書。這並不是因為我沒有愛國心，而是因為我有一個自己的看法。國家興亡，匹夫當然有責。但匹夫要能盡責，必須先取得『救國』的知識和技能。僅憑一腔熱血，未必有濟於事。讀書應該不忘救國，但救國先必讀書。」（頁36-37）這是他在遊學美國時抱定的一種想法。

蕭公權的另一看法似乎更能說明其選擇職業的取向，也顯示他的不同流俗。這一點從他對「學而優則仕」的獨到闡釋中可窺一斑。「在

現代的生活，『仕』應當廣義解釋為『服務社會』，不必狹義解釋為『投身政治』。政治不是人群生活的全體，政府也不就是國家。『從政』以外盡有個人效忠於國家於社會的行動場地。『匹夫』可以對祖國的經濟、教育、科學、文藝等工作有所努力而肩負了『興亡』的責任。」（頁37）

在做出如上新穎的解說之後，蕭公權把兩種人作了頗有見地的對比：所謂「自了漢」和「干祿」的政客。「一個『自了漢』如果真能自了，樂業安分，仰事俯蓄，不為國家增加社會、經濟或政治負擔，使政府減少內顧之憂，可以放心放手，用全力去辦理內政外交的大事。這何嘗不是匹夫略盡興亡責任之一道？這不是說『自了漢』不關心興亡。在一個民主國家裏，他雖不從政，但可以留心政事。在選舉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吏的時候，他可以本着自己的見解和良心去投票，去執行『選賢與能』的義務。這更是匹夫盡責之一道。」（頁37）從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青年蕭公權腦海裏浮現出平民自治之美利堅的夢影。

那麼另一種人呢？「至於『干祿』的政客，未做官時放言高論，做了官以後不辭『自求多福』，同流合污，所謂『窮則兼善天下，達則獨善其身』。他們對於『興亡』未必比『自了漢』有更真實的貢獻。……但我相信，一般拼命做官的人不但不為國家解決問題，甚至為國家製造問題。說得不客氣一點，他們都是『亡國大夫』的胚子。」（頁37-38）顯然，這是本土官僚的現實眾生相，和上一種人形成一種鮮明的比照。在蕭公權眼裏，「拼命做官」的政客，自然不及「略盡匹夫之責」的「自了漢」。

晚年的蕭公權仍堅持認為自己學生時代的觀點是正確的。他稱之為「求學和出路的兩點認識」。正是在此種觀念的引領下，他選擇了不做官只求學的學者之路，並為此寫下這樣的文字：「我雖在幼年時曾作『兼善』的幻想，所幸後來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沒有『管理眾人之事』的才幹，因而藏拙安分，『舌耕』自了，無由犯『達則獨善』的過失。」（頁38）

抑制自己的年輕幻想和血性衝動，毅然避開所謂「治國平天下」的書生從政「兼善」之途，甘作「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的學者顏淵，寧願「舌耕」、「筆耕」以自了樂業，不願「達則獨善」而「製造問題」，這樣的自知之明、自勝之強無疑是難能可貴的。這是游移彷徨的知識人做不來的，更是「拼命做官」的讀書人不屑為之的；然而正是這種純學人的存在，開闢了現代學人的獨立和自治之旅，延續了學術的精神和命脈。

二 「知新而不棄故」

身受中西兩種文化浸染，蕭公權最突出的稟賦是「知新而不棄故」。這既反映在他對於家庭婚姻的態度和做法，也處處體現在他為學論世的觀念主張之中。因此，在今人看來，他的言論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確屬另類。

比如對待傳統家庭，新文化運動是把它視為舊倫理道德的淵藪和據點，乃至宗法社會的根基來批判的，而蕭公權卻結合個人的經歷對傳統家庭做出這樣的評判：

「一個人的性格和習慣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當中養成的。……五四運動的健將曾經對中國舊式家庭極力攻擊，不留餘地。傳統家庭誠然有缺點，但我幸運得很，生長在一個比較健全的舊式家庭裏面。……因此我覺得『新文化』的攻擊舊家庭有點過於偏激。人類的社會組織本來沒有一個是至善盡美的，或者也沒有一個是至醜極惡的。『新家庭』不盡是天堂，舊家庭也不純是地獄。」（頁11）

對於舊式婚姻，蕭公權也自有一套主張：

由父母之命而成的婚姻，不及由自己選擇而成的婚姻美滿。這是五四運動以來流行於中國知識階級間的信條，其實婚姻是否美滿並不全由「自主」或「包辦」而決定。自主的婚姻有時可能基於雙方的錯誤選擇。其結果不是家庭幸福而是夫妻反目，甚至走上離婚之路。在交際自由的社會裏，青年男女容易因一時感情的衝動，不考慮對方的性格、志趣等等是否與自己相近，便冒昧地結合了。這樣盲目的自主婚姻是有危險的。父母之命的婚姻，就男女當事人來說，也是盲目而有危險的。但事實上這樣的婚姻也未必結果悲慘。簡單說來，婚姻是否美滿，主要關鍵在當事人是否有志願，有誠意，有能力去使之臻於美滿，而不在達成的方式是自主或包辦。據說若干年前有某西人對伍廷芳譏笑中國父母作主的婚姻，認為這是缺乏愛情的結合。這位中國先進外交家反唇相譏說：「中國人結婚是愛情的發端，西方人結婚是愛情的終止。」這不只是俏皮的辭令

身受中西兩種文化浸染，蕭公權最突出的稟賦是「知新而不棄故」。這既反映在他對於家庭婚姻的態度和做法，也處處體現在他為學論世的觀念主張之中。他的言論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確屬另類。

而是有根據的實話。……我認為除非一個青年確實知道父母代擇的未來配偶有重大(乃至不重大)的缺點，他很可不必反對。(頁78)

蕭公權是怎樣看待中西文化的呢？「在師友策勵之下，我在六年的當中獲得一些有關西洋哲學、歷史、社會、政治的片斷知識。……稍可引以自慰的是我對於西洋文化尚能略知其梗概，對於西洋學術尚能略窺其門徑，對於研究學問的方法也略有所領會。換句話說，六年的留美讓我建立了今後學術工作的初基。」(頁65) 儘管西學開始滲透頭腦，但蕭公權並沒有忘記在舊式家庭和舊式教育中學到的東西，而且這些東西已與他經歷的生活糅雜在一起，難以分離。其實，這種所謂的「知新而不棄故」，為他「通今古，貫中西」(頁19)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源頭活水。他特別提到：

還有可以引以自慰的是，我認識西洋文化的優點，卻不鄙視中國的固有文化，以為毫無價值，必須悉與拋棄。……我相信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優點和缺點。我們要用虛心的批評態度同時去檢討中西文化。囫圇吞棗式的中國文化論——數千年的文化積累必須一筆勾銷，或不合時宜的「國粹」應與全部保留的主張——我們不能接受。我出國以前讀過的一些中國書，也得到一點實際生活的親身體會。由此我得到一個認識：中國文化當中固然有不合時，不合理的成份，但也有若干觀念仍然有現代的意義。例如「民惟邦本」，「天視自我民視」，「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等，在

今日任何「文明的社會」裏都可以適用。根據這認識，我立了一個志願：我今後要利用留美所受的一點訓練，所得的一點知識，去從長研究中國文化。我在美國曾研究西洋政治思想。我回國後的主要工作當是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頁65)

作為生活在那個思想急遽變革時代的年輕人，蕭公權的「一己之見」似乎顯得保守或老成一些，對此他有自己的解釋：「因為我生長在一個舊式家庭裏面，又養成了高度的書呆子習性，雖然面對着一個新時代(一個政治、社會、文化都在動蕩的時代)，我好像是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豈但不關心，在思想上甚至趨於『反動』。我批評提倡白話文學者的言論，認為過於偏激。我不贊成『打倒孔家店』，認為反對孔子的人不曾把孔子的思想與專制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分別去看而一概抹煞，是很不公平的。現在回想起來，我真是不識時務，但我不能承認我的看法毫無理由。」(頁35-36)

從所謂「進步」的主張看，蕭公權的「不合時宜」與「不識時務」是十分明顯的，連他本人在追憶往事時也作如是觀。然而，對於一個謹記「通今古，貫中西」家訓而自勉的學人，這種與世事若即若離、持論不偏不倚的個性卻是一種可貴的資源。對求學問者而言，偏頗激進不如中庸持平，好走極端遜於兼收並包。前者往往困於狹隘的時地，其結果是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不能做到理性公允。作為思想者，他會離真理愈來愈遠；作為政治人，他則距專制愈來愈近。

從所謂「進步」的主張看，蕭公權的「不合時宜」與「不識時務」是十分明顯的。然而，對於一個謹記「通今古，貫中西」家訓而自勉的學人，這種與世事若即若離、持論不偏不倚的個性卻是一種可貴的資源。

三 「畚泥墊路」為後學

在美國留學期間，蕭公權深切感受到發達國家中大學那種「學術共同體」的氣氛，這是他最為欽羨的地方。學術共同體給予其成員的是健全的理性，而不是偏激的觀點和非理性的衝動。這一點十分符合他的治學志趣，而這種學術共同體對他的薰陶和形塑，是通過他所接觸的一個個師友獲得的。

他在自傳中最为津津樂道的就是在大學中建立的「師友之情」。他有這樣的自白：「自知一生毫無建白，不但談不到『立德』『立功』，便『立言』也不能做到。數十年來在國內外的教室裏東拉西扯，不能算是講學，東塗西抹，耗費了不少的紙墨，也不能成『一家言』。我這樣的人是沒有資格，沒有理由寫自傳的。然而自念七十年來所受於親長師友扶持栽培之恩，至深且大。若能向《傳記文學》的讀者作一簡略的報告來紀念他們，或者可以勉強作為我對他們一點細微的報答。」（〈引言〉，頁1）後來他用一句詩總結了自己六十六年所謂問學諫往的感想，即「文章事大才難任，師友恩多報未能」（頁223-24）。

在自傳中，他不吝筆墨向讀者「報告」了那些品格高尚、治學嚴謹、學風開明的師友。比如他的業師狄理 (Frank Thilly) 教授。他回憶到：「我到康乃爾大學的主要目的是受業於狄理教授，三年當中我和他接觸最多。……他為我規畫一切，極其周詳妥善。個人求學的志趣和學業的平衡發展都同樣顧到。他指導我，和其他研究生一樣，注重思考啟發而不偏向灌輸知識。他

有他自己的哲學立場，但不強人從己。反之，他鼓勵學生個人自尋途徑，自闢境地。學生所見縱然不合他的主張，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也任其並行不悖。」（頁56）「我在康乃爾大學肄業時狄理教授已是六十歲以上的學者。他不但為人不倦，並且學而不厭。晚餐之後，他經常到大學裏他的書齋去閱讀或寫稿。一燈熒然，每過乙夜。後來我在國內外大學任教，看見若干同人在晚間（甚至日間）『無所用心』，或『博弈』，或『聊天』，因而對於狄理教授的欽佩，不禁歷久而愈深了。」（頁57）

又如誼友愷德林 (George E. G. Catlin) 教授。「政治系的愷德林教授……給與我的啟迪和鼓勵也使我畢生難忘。他是英國人，在牛津大學畢業後到康乃爾大學研究院來進修。因為他博覽敏思，政治系請他講授政治思想的課程。於是他同時具有兩重身份：政治系的助教授，哲學系的研究生。他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的同學。（但我只當他是我的老師。）我在他所指導的近代政治思想研討課程不時發言，每每得着他的讚許。我交上去的專題報告都蒙他評為甲等（“A”）。我寫博士論文時，他悉心與我研討。我對若干理論問題的看法與他的主張不甚符合，因而時相辯難。他任我自申所見，並不為忤。1926年5月我的論文脫稿，他立即介紹到英國出版。我回國之後他繼續關心我的學業。民國十六年（1927）我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他來信勸我向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申請研究補助金，以免浮沉於粉筆生活之中，學無長進。……1958年他應美國華盛頓大

在美國留學期間，蕭公權深切感受到發達國家中大學那種「學術共同體」的氣氛，學術共同體給予其成員的是健全的理性，而不是偏激的觀點和非理性的衝動。這一點十分符合他的治學志趣。

蕭公權一直反對「先入為主」的「假定」作為學術研究的起點和前提，堅持學術研究以資料的搜集、甄別和選擇為基礎，以基本的科學事實作為治學的資源和礦藏。這種獨到的學術觀和嚴謹的治學方法，是他畢生學術建樹的根基和源泉。

學政治系邀請作一星期的學術講演。他一到學校便問起我。我那時正在這校任教，聽見他來了，便去看他，暢談了幾次。學術、時局，以及康乃爾大學的舊事都在我們談話範圍之內。這是我二次到美一樁最愉快的事。」(頁57-58)

蕭公權這樣總結：「如果大學教育的功用不只是教師把已得的知識傳授給學生，而是前輩指引後輩，使能各就其適可之準，向着學問之途，分程邁進，狄、愷兩位教授可以說對我用了教育家最好的方法，盡了教育家最高的責任。」(頁62)

如果說蕭公權在兩年清華大學期間產生了不做官、專求學的所謂「自了漢」式志向，那麼留美六年無疑給了他更多的東西，甚至是他終身受用的東西。他接受了作為一個學人的啟蒙教育，懂得了作為教育家的最高責任和最好方法，獲得了一種只有在學術共同體裏才有的師友之情。從此，他真正放棄了中國傳統士人的「兼善」理念，避開「學人從政」之途，不管經歷怎樣的時代風雨，面對怎樣的人生際遇，而一心過起自己的學人生活來了。

可以說，留學生涯在激發他詩人感性的同時，更多地是給予了他作為一個學人的成熟理性和高超技藝。這從他發展或者修正胡適的治學理念上可見一斑：「胡適先生談治學方法，曾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名言。我想在假設和求證之前還有一個『放眼看書』的階段。……看書而不作假設，會犯『學而不思則罔』的錯誤。不多看書而大膽假設，更有『思而不學則殆』的危險。……『學者』，『思想家』的

錯誤假設，非同小可，可能會產生重大的後果。照我看來，不曾經由放眼看書，認清全面事實而建立的『假設』，只是沒有客觀基礎的偏見或錯覺。從這樣的假設去求證，愈小心，愈徹底，便愈危險，近年來有若干歐美的『學者』因急於『成一家言』，不免走上這一條險路。」(頁59)

後來在華盛頓大學任教期間，蕭公權針對美國學者所謂「中國研究」的方法，對早期的論點做了進一步的補充：「美國一般學者研究中國歷史或文化，往往首先設立『假定』，然後搜尋資料來證明所設的『假定』。我不敢，也不能採用這種研究方法。……我覺得三十年前，我在學生時代寫畢業論文的一套方法還有用處：『放眼看書』，認清對象，提出假設，『小心求證』。但現在因為適應實際上的需要，我加以修改。『放眼看書』輔以『小心抉擇』。這一步工作做得相當充分，不必去大膽假設，假設自然會在胸中出現，不必去小心求證，證據事先已在眼前羅列。」(頁211)

作為學者的蕭公權，一直反對「先入為主」的「假定」作為學術研究的起點和前提，堅持學術研究以資料的搜集、甄別和選擇為基礎，以基本的科學事實作為治學的資源和礦藏。他把所謂的「放眼讀書」界定為如下兩點：「一是盡量閱覽有關的各種資料，二是極力避免主觀偏見的蒙蔽。」在如何從事專題研究和學術論文的寫作上，他的感悟是：「……不可全憑主觀，只摘取與己見相符的思想或事實以為證據，而自圓其說，把一切不相符的思想事實，悉數抹煞，與以視若無睹，

存而不論的處置。坦白的說，這是一個自欺欺人的下流手法。荀子書中有三句名言：『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辨〕』。我們如果把這三句話改成『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便可以作為我們寫學術性文字的座右銘。」(頁60)

這種獨到的學術觀和嚴謹的治學方法，是蕭公權畢生學術建樹的根基和源泉。晚年的蕭公權在學術重鎮美國，就是以此來矯正所謂「中國研究」的缺失偏差，盡一個在美的中國學者的責任的。

放眼現代中國文化的歷程，無論是五四時期的「大膽假設」，還是文革時期的「主題先行」，都在追求一種以主觀成見為主旨的「造勢」，而把與其不相符合的事實全盤抹煞，把與其不相符合的觀念主張視為「異端邪說」，並本着黨同伐異的原則加以清除。蕭公權的治學遺產無疑可資借鑒，作為現代中國文化的一服解毒劑。

在美國留學期間，蕭公權曾寫到：「在國家富強，社會安定環境之中，青年知識份子很少作『政治活動』。」(頁66)這是他理想中的社會，求學和教學均適宜的社會。而他的祖國卻是另一幅圖景——新舊軍閥的戰爭，八年抗日戰爭，然後是國內戰爭。他看到了亂世中所謂「腐化」和「惡化」的青年學生，以及學生中無為而「緘默的多數」。「腐化惡化的份子」是少數。多數的學生大體上安分守己。可惜『安分』的青年人不一定有遠大的志趣，對於學問也未必都有真摯的愛好。」(頁182)於是，懷着無望且無奈的心境，蕭公權又回到了他留學六年的美國，

開始他最後十九年漫長的華盛頓大學教學和著述生涯。

一代學人，平凡而崇高的學人，在自傳中生動地記述了自己的「最後一課」：

〔1968年〕5月31日我在華大授我最後的一堂課，結束我四十二年連續不曾中斷的教學生涯。當下課鈴響，我將要走下講台的時候，坐着的學生一齊起立，鼓掌致意。在美國近年來教師尊嚴日趨下降的時候，我得着這樣的禮遇，使我相信十九年的光陰不曾虛擲。我在走出教室之前對他們說：「當五十六年前一個春天，名哲學家兼詩人的珊達雅納 (George Santayana) 正在哈佛大學授課的時候，一隻知更鳥飛來站在教室的窗檻上。他注視這鳥一下，回過頭來對他的學生說，『我與陽春有約』“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於是宣布下課，跟着向學校辭職，退隱著書。他那時年紀還不滿五十，竟已從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沒有資格學珊達雅納。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聽見的秘密。照十一世紀中國哲學家邵雍計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一一完全重現重演。現在我與你們約定，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我們在這間屋子裏會面罷。」(頁218)

蕭公權，不該被後世淡忘的一代學人，就這樣告別了他「萬里寄蹤」十九年的美國教學生活——乃至四十二年的一生教學生活。

蔡 波 鞍山市行政學院副教授

放眼現代中國文化的歷程，無論是五四時期的「大膽假設」，還是文革時期的「主題先行」，都在追求一種以主觀成見為主旨的「造勢」，而把與其不相符合的事實全盤抹煞。蕭公權的治學遺產無疑可資借鑒，作為現代中國文化的一服解毒劑。